

聆听： 外语界前辈的声音

◎ 黄新炎 编著

聆听： 外语界前辈的声音

黄新炎 编著



W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外教社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聆听: 外语界前辈的声音/黄新炎 编著.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15

ISBN 978-7-5446-4046-6

I. ①聆… II. ①黄… III. ①外语教学-教学研究-文集
IV. ①H0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68733 号

出版发行: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上海外国语大学内) 邮编: 200083

电 话: 021-65425300 (总机)

电子邮箱: bookinfo@sflep.com.cn

网 址: <http://www.sflep.com.cn> <http://www.sflep.com>

责任编辑: 蒋浚浚

印 刷: 上海叶大印务发展有限公司

开 本: 700×1000 1/16 印张 14.5 字数 215千字

版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 000 册

书 号: ISBN 978-7-5446-4046-6 / G · 1282

定 价: 20.00 元

本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向本社调换

目 录

序.....	倪祥保 1
文字·文学·文化·思想	
——许钧教授访谈录.....	4
“目标始终如一”	
——谢天振教授访谈录	21
外语教师和中国文化	
——汪榕培教授访谈录	31
“变”与“不变”	
——杨治中教授访谈录	42
志在坚 功在久	
——方梦之教授访谈录	52
亦真亦幻和合人生	
——郭建中教授访谈录	63
如何打好语言、教学和科研基本功	
——黄源深教授访谈录	79
漫谈语言与语言研究	
——潘文国教授访谈录	93
老生闲谈	
——姚乃强教授访谈录.....	107
我的学术之路	
——朱永生教授访谈录.....	122

聆听：外语界前辈的声音

诗情·才情·激情

——薛家宝教授访谈录..... 131

我国 ESP 教学的开创者和奠基人

——卢思源教授访谈录..... 144

有好的外语教师,才有好的外语教学

——秦秀白教授访谈录..... 161

经典文学作品的翻译与解读

——郑克鲁教授访谈录..... 176

波普尔科学观的启示

——许余龙教授访谈录..... 192

新中国科技翻译史的参与者和见证人

——李亚舒教授访谈录..... 203

附录 青年教师如何成才

——与卓越同行的日子..... 219

后记..... 223

序

学习与感恩

黄新炎与我是新相识。

在一定意义上来说,他给我第一印象比较深的一点,首先不是他这个人,而是他一开始就送给我的一本书。书的名字叫《边地人生》。这是一本关于我国布朗山布朗族人生活实录的书,开本不大,装帧一般,但是图文并茂而情意真切。简单翻看一下,我觉得,他不仅是一个专业的图书出版工作者,而且还是一个注重学习和自觉感恩的人。

如果把《边地人生》这本书看作黄新炎努力以“画面加解说”方式为主来关注人类、考察社会的一个作品的话,那么,《聆听:外语界前辈的声音》这本书,则是他以口述历史的方式来学习人生、思考生活的一个很好成果。

至少从打响鸦片战争第一炮时开始,很多中国有识之士就开始更加努力地擦亮眼睛看世界,放下架子学洋人,于是,学习外语就成为其必不可少的一个重要方面。由于不是很多中国人都有条件出国去学习外语和学习外国的文化科学技术,因此,在本土开展外语教学,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中国近代教育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其中,英语教育更为主流与不可缺少,于是,中国的外语教育名家,相对而言,也就更多出现在英语教育领域。

我是1966年小学毕业生。高中毕业后半年,被母校聘为民办教师去从事英语教学工作。为了不误人子弟,我每天坚持早上起来听

广播学英语节目，白天课余时间拿着字典认真备课，有空的时候一字一句地去啃读学校里除教材以外几乎是唯一的英语读物：China Daily，晚上则在办公室里反复听学校唯一的一套英语教学唱片。那种辛苦和那种快乐，现在想来还是很有意义。但是与本书所记录外语教育名家的辛勤劳动和累累硕果相比，那简直就是沧海一粟。在本书作者所访谈的外语教育名家中，很多人都将从事教育事业和实现自己人生理想结合起来，从国家和民族千秋大业的角度上来认识自己的本职工作。这都非常难能可贵。说实在的，书中所涉及的那些外语教育名家，除了著书立说，发表学术论文，平时并不缺乏到各地作学术报告的机会，但是相对而言，他们很少拥有直接与人分享其人生经历与故事的机会。因此，黄新炎所写作并出版的这本书，可以使那些为中国外语教育呕心沥血、奉献生命的大师们的教育经验和人生经历得到很好的传播，使更多人能够学习分享与传承弘扬。在这个意义上来说，这本书对于那些外语教育名家丰富的教育经验和精彩的人生故事也是一种抢救性的纪录保护，并且也是我们文化传承中非常重要而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

任何语言都是人类文化生活的产物，不同的语言文化，与不同人们的物质生活、精神世界密切相关，因此，学习外语其实也是在向他人学习，学习他人与我们不同的社会生活、文化艺术和思想逻辑。这在很大程度上造就了很多外语教育名家的学术视野开阔、人生态度豁达和精神境界高远。对此，我在充满钦佩之情的同时，也有一种独特的向往与羡慕。1977年恢复高考的时候，我报考的绝大部分专业都是师范，其中首选是英语，也顺利通过了笔试和面试。非常可惜的是，当年大学招生录取的时候，对外语专业学生（包括师范）提出了年龄要求，我就被拒绝在了英语专业的门外。现在回想起来，我至今还认为那应该是我人生中的一大憾事。不然的话，我应该会和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的黄新炎认识更早，交往更多。当然，更为关键的是，我因此肯定能够了解更多不同于我耳濡目染的文化，深入交往更多国家的朋友，深度接受更多不同文化思想的碰撞与启迪，写出更多具有别开生面的学术论文……

为此，我一直对真正懂得一门外语的人保持充分的敬仰之情，尤其对于外语教育名家，更是始终钦佩有余。黄新炎这本书里所采访

的外语教育名家,都是对中国外语教育做出了很大贡献而德高望重的优秀教师,其中有的是因为工作原因认识而令我特别敬重的前辈,有的还是给我很多帮助的好朋友。我觉得,黄新炎所做的这项工作,应该表征着他对于外语教育的真正热爱,对于外语教育名家的非常敬爱,对于文化交流的十分珍爱。换句话说,他对外语教育名家所具有的虚心学习态度,其实与他感恩教育、感恩社会的思想情感完全一致。为此,我非常愿意为他的这本书写序,希望与读者共同分享他这份感恩教育、感恩社会的赤子之心。

倪祥保

苏州大学电影电视艺术研究所所长

2014年8月

文字·文学·文化·思想

——许钧教授访谈录

许钧简介

男,1954年生,浙江龙游人,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浙江大学求是讲座教授、北京大学欧美文学研究中心兼职教授。兼任南京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2005—2015),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六届、第七届外国语言文学学科评议组召集人,全国翻译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翻译协会常务副会长,江苏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并担任 *META*、*BABEL*、《外语教学与研究》、《中国翻译》、《外国语》、《外国文学》、《南京大学学报》等国内外 10 余种学术刊物的编委。已发表文学与翻译研究论文 250 余篇,著作 7 部,翻译出版法国文学与社科名著 30 余部,其译著《追忆似水年华》(卷四)、《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诉讼笔录》及著作《文学翻译批评研究》、《翻译论》、《文学翻译的理论与实践——翻译对话录》等作品,主编或合作主编出版《现代性研究译丛》、《文化与传播译丛》、《法兰西书库》等大型文丛,先后十余次获国家或省级优秀成果奖。1999 年获法国政府颁发的“法兰西金质教育勋章”;2007 年被评为首届“南京十大文化名人”;2008 年和 2010 年两次获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颁发的“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指导教师”称号;2011 年获宝钢教育基金全国优秀教师特等奖;2015 年获江苏省委、省政府颁发的“江苏社科名家”称号。

早年的求学之路

黄新炎:许老师,您是我国外语界著名学者,是广大青年外语教

师心中的楷模和偶像,大家都非常想知道您是怎样一路走来的,希望能够在许老师的成才之路上得到启发。

许钧:非常愿意与大家交流。我1975年大学毕业,到今年已经整整38个年头了。这一路走来,取得了一些小小的成绩,我非常愿意与大家分享我的经历,如果我们的交流中,青年教师有一两处会心的微笑,我就非常满意了。我1971年开始学法语。很多人有非常显赫的学历,而我没有。我没有读完高中,高中只读了三个月就去当兵了。当兵一年后就被选为所谓的工农兵学生。那个时候的工农兵学生,后来几乎不算学生,大家都看不起。当然我很幸运,1976年以后去法国留学,呆了两年。在法国两年也不让拿学位,所以直到1985年时还有人问,我的学历到底算什么,是本科还是大专,我有点不服气,所以就去考。我31岁时才读了硕士,考的是南京大学法语专业翻译研究方向的研究生。1988年毕业以后,我在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工作,到了1991年,学校不再招收法语专业学生,我就离开军校,到了南京大学。

黄新炎:南京大学是我的母校,我1993年进入南京大学学习的时候,就已经听闻许老师的大名了。据说许老师是南京大学破格从讲师提升为教授的第一人,是不是这样?

许钧:我是1991年9月进的南大,当时一般有个不成文的说法:转业军人五年不提房子、不要谈出国、不要提职称。到南京大学报到第一天,教务员告诉我,我第一个学期上三门课。我第一天报到第二天就上课了,上四年级的精读课,还有翻译课等。

第二年开始申报职称。当时我是讲师,外文系领导为我争取到了破格申报副教授的机会。当年九月申报材料报上去以后,跟我同批的老师职称都批下来了,而我的职称迟迟没有音讯。我以为自己肯定没戏了。没想到年底学校批文下来了,我被破格评为正教授。那些从国外回来的博士,他们比我早进学校,而我却先于他们被评为正教授。我从来没有想过能当教授,我认为作为一个转业军人,能到南大当个讲师已经非常开心了。在南大,我也没有去读博士,因为四年后我就被评为博士生导师了。那时全国还没有法语博士,我培养了中国第一批的法语博士。我带的第一个博士毕业时只有25岁。2005年,南大让我一个没有博士学位的人去当研究生院副院长,后

来又当了研究生院的常务副院长。我深深感受到了南京大学对于外来者的宽容与爱护。

黄新炎：许老师从讲师破格提升为教授，从没有读过博士破格提升为博导和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一方面可以看出南京大学不拘一格使用人才，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许老师的业务能力和学术水平，在当时已经达到了相当的高度。南京大学教师队伍强手如云，职称评审异常严格，我想，破格的背后一定是许老师卓尔不凡的学术成就。可以和我们讲讲您的心得体会吗？

许钧：我一没有好的学历，二没有上过好的本科学校，但这不阻碍我的追求。追求本身就像西西弗斯不断把一块巨石往上推，贵在坚持。回首自己走过的路，我觉得有几点特别重要。

第一我想说的是意识，讲科学研究的人都说要有问题意识，要有科研意识。世界上的事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的。首先要去想，想了才有可能，不想永远没有可能。这种意识的养成就是凡事要思考，要有所追求地去思考。我大学毕业后在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工作，三年学习法语的过程中，我没有见到一个法国人，没有听过一个法国人当面说过话，我去法国留学前，在北京语言学院集中培训时见到一个法国人，非常兴奋，就凑上去了。第一句话就问：Comment vous appelez-vous？（您叫什么名字？）这句话是在上大学的时候学的，非常合乎语法，他听懂了，而他的回复换了一个方式：Tu t'appelles comment？（你叫什么？）他说的话和我学的完全不一样，再一连音我就没有听懂。学了三年法语，连“你叫什么名字”都没有听懂。当时我有很多感触，我的语法很好，听写也不错，都考90多分，后来留校当老师，为什么法国人说的一句很简单的话都听不懂呢？一琢磨，关键是语法的变化，活生生的语言现象，我在书本中没有学到。所以，到了法国后，我选了一门课：新语法现象。我发现很多东西和我在学校学的不一样。这门课我特别喜欢，我做记录，老师讲的不明白我就去查，慢慢就培养了一个意识，对法国新的语法现象要有所了解，大量记录，去看报刊，把新的东西记下来。再去看新的小说，把新的语言现象记下来。一年多以后，我一共整理了一百多页。留法期间我学了很多东西，我以为这个最为重要，和我在学校学的都不一样，我回国之后特别兴奋。有人问我，你在法国收获大吗？我说大。问我都

学了些什么东西？我说我学了很多东西，新的东西。我1978年回国，那些老师都是20世纪60年代在法国留学回来的，其中还有一个在法国呆到19岁才回到国内，我自告奋勇要把我学到的东西讲给他们听听。那是我第一次做讲座，我的那些老师说我讲得还不错。于是我就整理出了一篇一万多字的文章，叫《法语中近年来常见的新语法现象》。因为这是我在法国留学留心整理的东西，是我过去在国内学习中没遇到过的，或者说是不同的。写啊写，改啊改。没有人教我，写完之后也不知道投稿，我自己去找杂志，打算投给《外语教学与研究》，现在叫一流刊物，在这本杂志上发表文章很难很难了。我看了他们的杂志，竟然发现那年的第一期有人写的文章题目和我几乎一样，叫《法语中近年常见的新语法现象》。再一看作者，是我们法语界的权威——语法专家陈振尧老师。我好不容易写了一万多字的文章，一看人家1979年第1期已经发出来了。那种打击超乎想象。但是我养成了一个习惯，就是凡事要去思考，于是我去读他的文章，一读我发现了两点，一是我认为他说的某些语法现象不是完全新的，就像时尚会变换一样，语法现象也会轮转，因此他文章中的有些新语法现象不一定全新。另一点，就是我一个20多岁的小伙子，一个连语法研究到底是什么都不完全知道的人，选的研究题目却和权威学者的一样。既然读他的文章，我发现了我和他的不同之处，于是想要说几句话。这很重要，一个人搞研究不能凭空乱说。首先要听别人怎么说，然后慢慢才有话想说。我觉得他说的内容有些方面可以商榷，有些方面他也没有提到，于是我就把我和他写的差不多一样的东西删掉，删了6000多字，就剩了三四千字。删的过程很心疼。我再去读书，慢慢形成观点，加了一些我的观点和认识，取了个题目，叫《对〈法语中近年常见的新语法现象〉一文的意见》，不到四千字，这是我平生第一次投稿，这篇文章在1979年的《外语教学与研究》第4期上发表出来了，有人说看到我的文章不相信，小伙子与权威商榷的文章也能登载在我国外语界最权威的杂志上？那时连很多老先生都没在上面发过文章。

黄新炎：说到写论文，不少老师都说评职称难，现在对于论文写作与发表的要求越来越高，论文始终是评职称的一大难点，您担任国内外10余种重要学术刊物的编委，发表论文200余篇，您的经验是

什么？

许钧：在《外语教学与研究》杂志上发表文章让我尝到了甜头，要有整理资料的习惯，要有思考的习惯，还要有把这种思考形成文章的意识，写文章不是为了投稿，而是为了对话。有人问我，文章写了投到哪里？我认为这种想法不对，现在写文章不是随便写一篇去投稿，首先要看国内外相关杂志近五年在讨论什么问题，讨论的问题和自己想的问题的共同点和不同点，所谓的研究是见前人所未见，这是最高境界；其次是对老问题有新看法；再次是综合类写作，众说纷纭、各执一词、莫衷一是时我来进行一点总结，将不同点进行逻辑分类；第四是商榷争鸣，别人讲后我有不同观点；第五是我认为你们讲的对，但是漏了一小点，属于补遗。这五类在研究中都是非常重要的。光考虑写了文章投到哪里，说明没有建立写文章是为了学术交流的观点。要和什么人进行交流，和法国人进行交流，是写给法国人看的，要看法国同行以前说过什么，怎么说的；写给中国人看的，要看中国同行以前说过什么，怎么说的。这些都要求你对五年之内甚至更长时段的杂志上同类问题的研究了如指掌。

我每次给研究生上课时，都会对他们说，你先告诉我，对你目前选定的研究方向来说，国内国外最重要的杂志是什么？最重要的学术资源是什么？最重要的电子资源是什么？要是连这些都不知道，怎么去搞研究呢？比如翻译研究有哪些刊物，这些刊物分别在哪些国家，近五年来这些刊物讨论了哪些主要问题。因为你要插进去说话，你不了解别人在说什么，怎么有话说？你要了解、读书。所谓的继承就是倾听前人在说什么。而且你不能断章取义，要摸清事情的来龙去脉，这时你说话才有底气。要在对学术圈了解的情况下，选准自己的东西，你的文章就是为这本杂志而写的。要是四年前杂志就讨论过，你还有什么好说呢？最近有个非常有名的刊物，叫《文学评论》，有编辑约我写文章，这是中国文学界最好的杂志，我当然想在上面发表文章，可我对编辑说，我要先读读你们五年内发表的东西，再想一下写些什么，有话说再写，有针对性地写，参与学术交流最重要。

养成好的意识之后，就是形成习惯，要读书，要了解，收集资料，寻找话题。所谓话题就是问题，你有话要说不能只说一句。读书时，

我特别关注国内国际学术发展的历史和学术前沿的动向,开始了就一直坚持下去。我的研究生都知道,我隔一段时间,就会去南大图书馆转一圈,把主要的杂志翻一翻,特别感兴趣的就复印带走。读了,就会有很多想法,读多了、看多了、听多了就想说话。我有个本子,经常会记一些重要话题。我把题目记下来。很多人做学问是这样:定下来题目去找资料,等资料找全了再写,然而资料哪有那么容易找,特别是一些第一手的资料,这样一来一年两年文章都写不出来。我的方法是这样,我有一个本子,每当有一个好的题目,好的想法,就有意识地把它们记下来,将记下来的题目在本子上空出二三十页。一般会有七八个题目。我平时读书,看到相关资料就记在本子上。世上只怕有心人。比如搞收藏的都知道,你对这个东西关注了,感兴趣了,惦记了,遍地都是这个东西,你不感兴趣,就是在你面前你也看不到。我将读到的一些重要的观点、想法、思考都记录下来。在记的过程中,要有一个意识,一定要把出处记好。这方面有些国内学者吃了大亏,他就记录漂亮的词句、美丽的思想,但不标清楚出处,结果记下来以后,不知道是自己的还是别人的。时间长了,觉得那些思想是自己的,最后写文章时,以为是自己的就直接写在文中。国内有些名人就犯了这方面的错。记录、思考、整理,也许一个题目一两年也成不了文,看不出成果,可有了思考的习惯,长久积累后,突然有一天会发现主要问题明晰了,主要观点也有了。我写一篇论文,习惯就论文所论的对象提十来个问题,我们所说的问题意识就在这里。你谈一个东西,一定要有疑问,没有问题就没有必要去谈。所谓问题,第一,大家感兴趣;第二,别人没有解决;第三,你也没有考虑清楚。所以要提问。在写论文或做项目设计的时候,我们一般都会提五六个问题,问题都要能站住脚,凡是能够提出十来个问题的议题,别人一定会觉得有意思。把这十个问题按相关性进行分类,这一分类就自然形成了一篇论文的主体部分,写作的时候顺着这几个问题往下回答就是一篇文章。逻辑性就体现在你的提问当中,我一般一万多字的文章,三到五天一定能写好,因为长年的思考与整理,思路有了,观点有了,所有材料都是齐备的,会有冲动要拼命往下写。这种习惯的养成非常重要。到目前为止我有很多文章就是这么写出来的。这种题目就是平时在交流中、读书中、思考中冒出来的,很多东西都是瞬息即逝的,

不及时记下来就会丢掉了。所以我有时晚上睡觉时突然想到一个问题,会起床把它记下来,否则到第二天有可能就忘了,就没兴趣了,或者说就记不住了。这种意识会迫使你形成一个非常好的思考的习惯。

黄新炎：所以说平时的学习、教学工作过程中就要重视学术性论文问题意识的培养。这就需要教师在平时的工作中不断地积累和沉淀,平时就要养成对做学问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的敏感性并做出快速反应,注重培养自己的前瞻意识。

许钧：对的,有了意识之后,第二个问题就是做学问的视野。都说要有国际视野,要有学术视野,一个人有没有视野非常重要。我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在军校工作,纪律很严,不能私自与外国人接触,不许和外国人通信,那个时期学术环境非常封闭,对一个学者来说,封闭是非常可怕的。那时不让交流,不让和外国人通信。我就偷偷去做,早期写文章还用过笔名。学术视野与学术环境非常重要。在北京和在别的一个省会城市,见到的遇到的就是不一样。在国外,大家知道,以前许多作家和艺术家都要到巴黎去发展,因为那里是艺术的天堂,有助于打开视野。我讲一个事例,傅雷,他二十多岁到了法国,法语还不怎么精通,但是他到了巴黎,视野打开了,在时间上空间上都很开阔。到法国后,他去卢浮宫看画,看完后做记录,打开了视野,知道中国画需要什么,哪些与我们的中国画不同。他后来写了一本书,叫《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他就是多看多了解,发现不同。大家知道,做学问最重要的就是发现不同:各个时期的不同,历史上的不同,每个人之间的不同,共时的历时的不同。《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现在是中国艺术院校学生的必读书之一。

以前觉得,好地方大地方才能够有大视野,现在有了因特网,在国内就能得到法国图书馆的资料,只要有心,永远都会有一种寻找与发现的心态。我们看那些搞收藏的人,每次出去,他就到那些古玩市场、旧货市场去寻找和发现,有时找错也有可能,但是那种发现、那种惊喜是难以名状的。我们问问自己,在学术研究过程中,备课也罢、做学问也罢,有没有过发现的惊喜。在学与问的过程中,一个人的学术视野不断打开,对以后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学术视野的打开有时会令人明显感到自己的不足。比如说我以前在解放军外语学院,

好的书、新的书不太容易看到,我就和南京大学的老师联系,去借书,去请教。比如向何如老先生、陈宗宝先生请教,经过他们的点拨,后来我写了不少文章。在20世纪80年代初,《外国语》、《外国语文》之类的杂志,我都去投稿。一方面我在写语言学的文章,写有关语法现象的分析文章,但是新语言现象只能到报刊、小说上去找。突然看到一本好的小说,我又被那些小说迷住了,就像遇到一个漂亮女人一样,怦然心动,自己认识还不够,还想要炫耀一下,迫不及待地想把读到的好小说介绍给别人。我读一本书,是一鱼多吃,做翻译,又研究语言现象。有的我没法理解,比如有的词一词多义怎么确定,有形象有比喻怎么翻译。慢慢就发现自己学的知识不够,就是说为什么要这么处理,要忠实应该怎么办,就在这么一种状况之下开始有了求学的欲望,再加上工农兵学生学历不知道怎么算,于是1985年我就考了南京大学的硕士,师从陈宗宝先生学翻译理论。

黄新炎:在南京大学读研期间,听说许老师还组织了首届全国研究生翻译理论研讨会,在当时有非常大的影响。是不是这样?

许钧:是的。那是1987年的时候,英语国家的一些翻译理论进来了,包括所谓的文化翻译论也进来了,因为我是学法语的,我的视野就相对不如学英语的人广。这时我想,我们能不能形成一个学术团体呢?我有这样一个意识,要开拓视野,有多种渠道,在学术团体里加强交流,就是一种。所以我在南大成立了一个研究生翻译学会,把对翻译有兴趣的研究生团结起来,组织起来,比如柯平、郑伟波,还有其他一些人。组织起来有个好处,法语、英语、俄语专业的研究生在一起,可以相互交流,通过交流能打开视野。我当时就通过与同学的交流学了很多东西。有了这么个意识和思想后,我又想,南大搞翻译理论的人还是少,能不能把全国的研究生团结起来呢?于是在1987年5月,我还在读研时,就组织召开了中国首届研究生翻译理论研讨会。据穆雷教授的考证,那可能是中国翻译界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翻译理论研讨会。我的目标非常明确:通过这个会议学到东西,每个参会的人都能带来新的东西,我能通过他们学习。现在看中国翻译学科发展史,这次会议是最早的全国性翻译学术会议之一。当时会议上来了不少研究生,如辜正坤、谭载喜等。这些人二三十年之后都成了中国翻译学科的重要人物。通过会议的交流,在对国外

翻译研究比较了解的基础上,我向教育部申请了一个项目,叫作“当代西方翻译理论研究”。通过这种交流,视野拓展了,学术能力也提高了。

在读研究生期间,通过交流,我收获确实多。我们研究生翻译学会的一些人,如张亚非,现在是南京理工大学的校长,还有柯平、郑伟波,为了开好学术研讨会,都做了很好的准备,写了很好的文章。这次会议之后,《中国翻译》有一期上登了三篇南京大学研究生的文章,都是与翻译文化学派相关的,是柯平、张亚非、郑伟波他们写的,后来我写的《论翻译的层次》,也发表在《中国翻译》杂志上。我们就是通过交流和研究不断扩展自己的视野,发表了文章之后在整个翻译界产生了影响。到了1990年,我给北外的蔡毅老先生、浙大的郭建中先生、川外的廖七一先生写信,建议我们要把国外新的翻译理论思想引进过来,打开国人视野,在这个新的视野当中讨论国内翻译理论问题。这么一来,就需要把国外近几十年的重要翻译理论著作和研究成果,介绍给国人。有了他们的支持,后来我们出版了一套丛书《当代西方翻译理论研究》,选择了苏联、美国、英国、德国、法国的翻译理论进行研究,这套丛书后来出了四本,德国那本一直没有出来。这套书对中国翻译理论界借鉴国外的先进翻译理论起到了重要作用。我当主编,也亲自做了一本。

黄新炎:这四本书所构成的《当代西方翻译理论研究丛书》,是我国翻译界引进西方翻译理论的开山之作,影响了后来国内的翻译研究理论研究,这套书的引用率很高,很有价值。今天,我们都在讲“中国文化走出去”,并上升为一种国家战略,在中国翻译理论国际化方面,许老师也开了历史的先河。请许老师介绍一下。

许钧:在打开视野的过程中,我又发现了一个问题。我发现当代翻译理论几乎都是西方的,没有中国的事。我就提了两个疑问:中国有没有翻译理论?国外了解中国吗?在提出问题的時候,我又产生了一个想法,这个想法也是自然而然产生的,即能不能把中国几千年来翻译实践和翻译研究状况做个总结,进入国际学术交流中去。我注意到一本非常好的杂志 *META*,它是世界上最好的翻译学理论杂志。1997年的时候,我对罗新璋先生说,我想让西方知道中国的翻译理论和研究现状。那一年9月,我给 *META* 杂志的主编写了一